容闳精神及其创造性传承研究

许 兰

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00

[摘要] 容闳精神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内核,其核心内涵包括教育救国的担当精神、务实笃行的实干精神、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容闳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这并非天赋的道德品质集合,而是特定社会存在在个体意识中的历史性投射。其形成是由地理—文化存在、时代—实践存在、个体—生命存在三个层次构成。容闳精神的传承应在“创造的继承”的方法论框架下探讨,如此才能在全球化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 容闳 容闳精神 留学计划 创造性继承

[课题项目] 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度课题,《容闳精神及其弘扬路径研究》(2025GJ047)

A Study on Yung Wing´s Spirit and Its Creative Inheritance

Xu Lan

College of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 Zhuhai 519000,China

[Abstract] Yung Wing´s spirit takes patriotism as its core value, and its essential connotations include the spirit of responsibility for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education, the pragmatic spirit of steadfast action, the rational spirit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and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Yung Wing´s spirit is a form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t is not a collection of innate moral qualities, but a historical projection of a specific social existence onto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Its formation consists of three levels: geographical-cultural existence, epochal-practical existence, and individual-life existence. The inheritance of Yung Wing´s spirit should be explored within the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creative inheritance," so that it can radiate new vital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words] Yung Wing; Yung Wing´s spirit; study-abroad program; creative inheritance

一、引言

容闳(1828-1912)是珠海历史文化名人,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促成清末幼童赴美留学以及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推动中国近代化。国外、境外(主要是台湾省)对容闳研究开始较早、成果丰富,大都聚焦于容闳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以及他促成清末幼童留美的事迹及其教育思想。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深入,容闳研究成为了众多学术会议的主题,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关于容闳精神品格的代表性研究有:罗华文分析了容闳教育救国理想的内在动力:强烈的爱国心和顽强的意志、执着的信念[1];沈潜考察了容闳现代化思想品格,凸现了他与时偕进的爱国精神、超人一筹的革新主张,以及尴尬边缘人的角色特征[2];郭颖指出容闳政治人格最突出的是:融合近代精神的爱国情感、积极的革命意识、民主的价值

[作者简介]

许兰(1980—)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取向[3] 陈才俊,冯东娜.容闳家国情怀表现为赤诚、忠贞、笃行[4]。

国内外对容闳的研究内容较为全面,但对其精神品格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几篇相关论文也是从某些角度进行概括。本研究将全面分析容闳精神的核心内涵,深入挖掘其形成机制与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推动容闳精神研究向更全面与更深入的方向发展。

二、容闳精神的核心内涵

容闳精神即容闳的精神,纵观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其一以贯之之道为“爱国心驱动救国行”,其精神可以概括为:

(一)教育救国的担当精神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美国教会可提供助学金资助他上大学,但条件是让他立誓毕业后回中国做传教士,容闳却宁可半工半读以便获得日后行动上的自由,认为如此才能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谋福利。后有机会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求学期间即萌生了组织青年留学美国以改造中国的想法,“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5]。容闳毕业后本也有机会在美国谋生过上优渥的生活,但他未忘其志,毅然回国。归国后容闳在香港、广州、上海四处奔波,屡易其业,都只为“稻粱谋”;后会见洪仁玕,发现后期太平天国的情势已经不能为其提供施展教育救国的机会;直至投奔曾国藩后才找到实现其“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依靠力量。归国十余年,容闳目睹了中国的贫弱、落后以及人才匮乏,深切感受到推进西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紧迫性,他适时提出举办留学教育,把“教育救国”的志向转化为具体的实施方案。在曾国藩等洋务大臣的支持下,容闳苦心孤诣地策划、组织,最终在 1872 年官派幼童留美计划得以实施,容闳以“副监督”的身份亲自参与其中。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破坏,1881 年清政府解散留学生事务所,撤回全部留学生,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中途夭折。虽然此计划最终失败,但对近代中国教育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留美学生们返回中国后“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兴办的各项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近代中国掌握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第一代人才”[6]。

容闳接受了比较完备的西式教育,作为第一个取得外国大学学位的中国人,没有将自己所学所获作为个人谋生与进阶之资,而是时时心系祖国之前途和命运,当个人前途与报国之志发生矛盾时,他也处处以后者为先。容闳的“教育救国论”“试图通过西式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和改铸国民精神,进而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此种主张在 19 世界中叶的中国看起来是一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浪漫空想,但从历史的长远目光来看却不失为一种掘根刨底的救世方策”[7]。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浪漫空想”最终能够推行(虽然最终失败),依赖于容闳在此过程中的殚精竭虑、竭尽所能,依赖于强烈民族主义精神下的赤子之心。他的教育报国之情、之志、之行,体现出强烈的“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二)务实笃行的实干精神

容闳“是实干家和活动家,‘做的’要比‘想的’和‘提倡的’多得多”[8]。在洋务运动中,他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引入西方“制器之器”,并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附属学校的建立。洋务运动初期,曾国藩有意建立西式制造厂,实行阶段容闳负责到美国采买母厂之机器,从 1863 年至 1865 年,历时两年圆满完成采买任务,运回机器一百多种,成为“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

容闳首倡创立中国轮船公司,1867 年他向清政府呈递《拟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倡议成立一家由中国人合股的民营轮船公司,与洋商分利。其主要内容包括股份构成、运营规划、船舶及人员配备等方面,还对集股办法、人事管理、股东地位及利润分配等也作了详细规定,总体上模仿了西式企业的运营方式。在第二年由丁日昌转递的“条陈四则”第一条中,又重申此方案。1872 年,李鸿章创立的轮船招商局的核心章程大都沿用了容闳的倡议。

容闳还筹划兴办国家银行和建筑津镇铁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鼓励民间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容闳一直致力于谋求国家富强,他抓住时机,提出兴办国家银行计划。1896 年拟具一系列翔实、完备、严密的近代银行建设章程和条陈,且已奏请批准,但由于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作梗,该计划遭遇了中途夭折的命运。随后提出用外资修筑津镇铁路的构想,并向总理衙门呈递修筑铁路的具体条陈,得到光绪帝的允准。容闳积极筹借资金,但

由于触及德国在华利益，容闳的建设铁路实践中途搁浅。虽然这些兴办企业的计划最终都没有经容闳之手亲自完成，但他无疑作为开创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容闳深知维护国家利权、使国家富强必须发展近代工商业，他为机器制造厂采买设备，倡导财政金融近代化，推动铁路交通近代化，并制定完备章程。其爱国实践体现出“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展现出将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实际需求相结合的务实态度。

（三）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

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看，容闳的开放精神表现为积极拥抱西方文明，不仅是物的层面的“师夷长技”，更是通过派留学生在人的层面实现文化修养和价值观念的更新，这种对异质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十分具有前瞻性。纵观容闳一生所为，他曾对太平天国抱持积极期望，向王洪仁玕提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内容，以早期近代化为导向的改革建议，但通过观察，发现“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9]；他曾依靠洋务派推动中国教育、财政金融制度、铁路实业近代化，这些具体举措最终都没能免除失败的命运，容闳对此悲叹：“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10]此后容闳放弃“从‘受知’于曾国藩以来一直沿用的‘求知当道，游说公卿’的求索政治模式”[11]，投身到维新派改良政治的变法运动中；保皇立宪运动失败后，容闳基于对时势的清醒认知，与康、梁等走向倒退的保皇派划清界限；晚年支持孙中山，逐渐与共和革命的潮流相融合。容闳对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选择显示出其“爱国不忠君”的一面，他的每一步选择完全基于时势下谋求“中国复兴”的理性思考，即便到了晚年他也不故步自封，能够理性地分析最新时势，改变认知，投身新的爱国救国事业。

（四）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容闳的创新精神贯穿其一生，鲜明体现于教育、经济与政治诸领域，呈现出随时代演进而不断深化的特点。教育方面，容闳是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最早提出者和实践者，在科举仍然是大部分读书人唯一正途的 1870 年代，他力推官派留学计划，开创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其“教育救国”的主张首次大规模实践；经济方面，他竭力引介西方工业文明，建议曾国藩采购“制器之器”，起草《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拟具《请创办银行章程》及《续拟银行条陈》，在铁路建设方面亦有筹画。这些方案大多未能完整实施，但其制度构想具有早期示范意义。政治方面，容闳投身洋务，其主张与建议都带有发展独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性质，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框架；晚年热情赞助康梁的维新运动、参加上海国会和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转而支持推翻帝制的革命。这种不拘泥于既定政治范式、不断根据历史形势发展顺应历史滚滚向前的潮流审视中国政治问题的品格，是其政治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

三、容闳精神的存在论溯源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2]，容闳精神是一种社会意识，其核心内容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救国担当精神、务实笃行的实干精神、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些并非天赋的道德品质集合，而是特定社会存在在个体意识中的历史性投射。其形成是由地理—文化存在、时代—实践存在、个体—生命存在三个层次构成，三者共同作用，生成了容闳精神的四重结构。

（一）第一层次：地理—文化存在——岭南边缘地带的中西交汇

容闳 1828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毗邻澳门。香山地处岭南边缘，是中西文化交汇激荡之处。香山人得风气之先，较早与西方文化接触，没有像内陆人一样固守“夷夏之防”，对西方文化展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别是普通百姓，从洋货的质地价格以及传教士的活动中渐次接触西方文明，其面对西学的心理负荷较之官绅阶层要轻得多”[13]。容闳 7 岁起到澳门入英国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3 岁入马礼逊学校，1847 年起随美国传教士勃朗赴美留学，先入孟松学校就读，1850 年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从教育背景看，容闳接受了较为完备和系统的西学教育，他在马礼逊学堂系统学习了西文与西学基础，在耶鲁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由此获得的不是零散的“西方印象”，而是一套能够对中西文明进行结构性比较的知识框架。这套框架使他成为中国士人传统中罕见的“比较性认知起点”的拥有者——他不是从“中国之弊”出发思考“如何从内部文化出发或以内部文化为根基进行修补”，而是从“西方之优”出发思考“如何把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明移植来对中

国进行改造”。这一跨境生命经验形成的“去中心化”视野，为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和教育救国的担当精神提供了认知前提。

（二）第二层次：时代—场域存在——实践空间与志业驱动的行动展开

第一层次分析了容闳“比较性认知起点”的形成——他在美国 8 年，广泛系统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文教制度，为他日后能对西方近代企业制度译介到中国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详细的、具体的制度章程提供了条件。在耶鲁时期确立的“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志业，“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14]的观念，构成了他实干精神的动力。但志业驱动还停留在认知层面，它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获得现实形态。

容闳回国后的实践轨迹，对应着近代中国从“器物”到“制度”再到“革命”时代大背景下对递进式危机的回应。每一次危机的加深，都意味着前一阶段的“解决方案”被历史否定，迫使行动者寻找新的出路；同时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也为容闳提供了实践平台，由于洋务体制与改良路径都无法容纳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平台大都具有有限性。实干精神正是在“问题紧迫”与“空间有限”的张力中生成的：他为机器制造厂完成采购机器任务后，曾国藩“极为嘉许”并“专摺请奖”[15]，为其日后通过丁日昌呈递留学计划创造了条件，也为在体制约束下推进“志业”落地打开变革空间；他以制度文本为行动载体，是为了将“志业”转化为可操作的方案，从机器制造到留学计划，从银行章程到铁路条陈，每一次行动都是“志业驱动”在具体问题情境中的展开。

（三）第三层次：个体—生命存在——跨国生命经验与“边缘人”视角

容闳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他受的西式教育以及长期在美国的生活使得他深度内化了西方文明的价值系统（包括民主制度、权利观念、基督教信仰等），另一方面又始终以“中国人”自认，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爱国情怀并非基于地缘、血缘而产生的天然情感，而是他在目睹国内外强弱差距、形成理性认知之后所确立的“志业”追求，因此他的爱国不是“忠君”意义上的传统爱国，而是以“复兴中国”为目标的现代爱国主义。这种特殊性，使得容闳形成了“边缘人”、“边际人”的角色特征：在两种文化中均未获得完全接纳，成为近代中国的“边缘人”。从身份归属看，他在美国生活半生，求学、结婚、生子，但对美国而言他是边际人；不幸的是，他对中国而言也属于边际人，一方面他对中华固有文化已相当隔膜，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体会不深，不能学贯中西，难以对改造新文化和建设新文化做出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少小离家，久居海外，也使他在国内缺少了一个由血缘（同族）、地缘（同乡）和业缘（同学）基础上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缺乏一种群体归属，缺乏社会改造活动所须具有的坚实社会力量。[16][17]这种边际人特征是他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实践活动屡屡碰壁的重要原因。

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正是这种“边缘人”带给他的广阔视野使得他得以超越同时代人，看到他们难以看到的东西。当同时代人仍在“师夷长技”的层面思考自强时，他已将目光投向更根本的问题——人的改造，他力推官派留学计划，开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纲领时，他已在思考超越器物层面的制度变革；甲午战后他通过翁同龢等开明官僚呈递银行方案，又经总理衙门奏报铁路计划，其制度移植的视野已开维新之先；康梁固守保皇立场时，他又超越改良路径，转向支持推翻帝制的革命。边缘人的身份使他“没有同时代中国人身上过重的传统包袱”[18]，不必在“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寻求心理调适，也不必在“保皇”与“革命”之间犹豫徘徊。但代价是他在两种文化中均未获得完全接纳，成为近代中国的“边缘人”。这种边缘性，恰恰是创新精神的前提条件：正因为不被任何一种既定范式完全束缚，他才能不断超越既有框架，不断提出新的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机械的“环境决定论”，社会存在提供的是认知边界与可能性空间，而非自动生成精神品质。容闳在入大学前拒绝美国教会资助、大学毕业后放弃在美国获得优越职业和富裕生活的机会坚定回国；回国后四处奔波，曾放弃轻松俸厚的海关职位，孜孜以求其“所希望之事业”。这些选择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在个体生存层面都不是“最优解”——教会资助是最稳妥的路径，海关职位是最舒适的选择。容闳选择这些“非最优解”，恰恰证明个体的价值判断与实践意志在精神品质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四、容闳精神的当代传承

容闳精神的当代传承，应采用“创造的继承”的方法论框架：“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19]容闳在一百多年前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具体方案，其具体意义已随历史条件的根本变化而失去了直接适用性；其具体方案所回应的历史问题，在当代已获得根本不同的制度形态与解决路径。但这些方案背后的问题意识与实践逻辑则具有跨时代的有效性。

（一）继承教育救国的担当精神

容闳“教育救国”的历史语境是民族危机下的“救亡”，当代语境则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期的“强国”，教育强国的战略定位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20] 这恰恰延续了容闳将教育置于国家发展优先地位的问题意识。在国际化践行场域，留学人员应将“个人受教”与“民族志业”相结合，当代留学人员继承这一教育救国的担当精神，意味着不能将留学视为个人履历的镀金，而是将跨文化知识积累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自觉。同时，还应以跨文化视野把国际前沿知识转译为本土可发展的方案。对容闳教育救国精神的创造性继承，应是继承其“以教育改造社会”的担当与跨文化视野，而不必固守其“以西方文化为价值核心、移植西方器物和制度”的具体路径。容闳方案的挫败恰恰说明：精神可以跨越时代，路径必须扎根土壤。当代知识转译工作由此获得启示——摒弃简单移植，在本土文化脉络中寻求可落地的具体方案，这正是容闳精神在新时代的转化性延续。在核心实践层面，全体教育工作者应以“人的现代化是国家转型的内生动力”为问题意识，推进人才培养自主性建设。换言之，容闳以教育培养人才改造中国的逻辑，是以通过留学培养少数精英的模式实现的，其当代继承不在于复制此具体形式，而在于将“人的现代化是国家转型的内生动力”这一命题，转化为以自主培养体系造就全体建设者的育人实践。

（二）继承务实笃行的实干精神

容闳实干精神的当代继承，核心不是“多做少说”的一般品质，而是以具体方案为行动载体、以可交付成果推进变革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的独特形态在于：他不以“是否适应既定框架”作为行动取舍的标准，而以“是否推进了根本事业”作为唯一尺度。从时代任务的古今对应来看，容闳的实干指向“救亡图存”，其行动压力来自民族危机的持续加深。当代实干指向“民族复兴伟业”，其行动动力来自这一中心任务的召唤。两者共享同一个逻辑：国家转型不是抽象目标的自然实现，而是由无数具体方案、具体实践累积而成的历史过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所强调的，正是这一逻辑的当代形态：民族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以具体实践共同推进，而非仅仅停留在讨论与建议层面。

（三）继承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容闳身上构成“认知—行动”逻辑：前者提供判断的参照系，后者提供行动的驱动力。没有开放包容的理性，创新迟早会退化为固守特定范式；没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理性也会退化为静观空谈。

在当代语境中，这一逻辑的传承体现为：以自主判断驱动实践创新。正如前文所论容闳的“双重视野”使他能够不断超越特定时代的范式框架，站在历史浪潮前进方向上见人所未见，这种能力正是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今天继承这一精神，在于继承其“认知—行动”结构：在文明互鉴中形成自主判断，根据自主判断驱动先行探索——即超越文明冲突、文明隔阂、文明优越，以平等视角审视他者，在共识尚未凝聚、经验尚属空白的领域，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姿态打开新的实践空间，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持续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应对方案。开放包容理性回答“凭什么能创新”，与时俱进创新回答“如何创新”——两者共同构成容闳精神中最具当代生命力的知行结构。

五、结论

容闳独特的教育背景与社会经历塑造了独特的容闳精神，容闳精神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内核，四重精神则是爱国主义在不同实践环节中的差异化显现：开放包容的理性精神是前提条件——无此则不可能提出留学计划；教育救国的担当精神是核心指向——原初“志业”与根本关切；务实笃行的实干精神是实践方式——以具体行

动或文本方案推动变革；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动态表现——方案随危机演进更替。容闳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必能在全球化与民族复兴的时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需要明确的是，容闳精神不是作为陈列于历史博物馆中的遗产，而是作为回答时代之问的思想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与实践智慧。

[参考文献]

[1] 罗华文.容闳的人生价值观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9(10):126-128.

[2] 沈潜.试论容闳的现代化思想品格 ——以<西学东渐记>为中心[J].历史教学问题,2009(4):23-27.

[3] 郭颖.容闳政治人格分析[J].学术论坛,2009(11):160-165.

[4] 陈才俊,冯东娜.容闳家国情怀的意蕴及实践[J].唐廷枢研究,2024(4):44-58.

[5] 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9.

[6] 黄顺力.容闳与近代“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A].容闳与中国近代化[C].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70.

[7] 张海林.王韬评传附容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393.

[8] 张海林.王韬评传附容闳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378.

[9] 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26.

[10] 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77.

[11] 刘学照.容闳“复兴中国”思想和活动略议[A].容闳与科教兴国——纪念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 150 周年论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229.

[12]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5:72.

[13] 陈新华.容闳与晚清中国留学教育的开启[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2 年(3):47-50.

[14] 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9.

[15] 容闳.西学东渐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45.

[16] 罗福惠.边际人的报国心——容闳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新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2):66-73.

[17] 沈潜.试论容闳的现代化思想品格——以<西学东渐记>为中心[J].历史教学问题,2009 年(4):23-27.

[18] 冀满红,周山仁.容闳与近代“西学东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4):66-69.

[19] 陈来.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J].文史哲,2017(1):5-20.

[20] 怀进鹏.奋力书写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N].学习时报.2024-3-29(1).